

论张爱玲小说苍凉的生成机制和现代性含蕴*

王 燕¹, 董学武²

(1. 浙江海洋学院 学报编辑部, 浙江 舟山 316000; 2. 浙江海洋学院 院长办公室, 浙江 舟山 316000)

[摘要] 苍凉在张爱玲的文本中拥有多种指向和生成方式: 不仅指时代氛围和身世感受, 更指向个体生存状态和人类命运, 不仅体现为一种主观情绪体验, 更承载着作者的存在之思。张爱玲的苍凉呈现出对庸常人生及传奇的消解和对丰盈生命的召唤, 刻画了人类存在的易逝和恒常性, 具有独特的现代性特征。同时, 张爱玲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深刻透视, 对于当下“人被遮蔽”的普遍现象及文学创作的日益物欲化和庸俗化具有警示意义。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 苍凉; 生成机制;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7)02-0122-05

提起张爱玲其人其作, 人们自然会想到“苍凉”一词, 并且被当作她的符码。与传统中国文学中“断井残垣”或“人生易逝”等正面表述的苍凉不同, 张爱玲所看到和所表现的苍凉是复杂的、参差的。在她的作品中, 苍凉弥散在“不断滋长的新的东西”和不断崩溃的旧的东西、难以把握的现实和对过去的回忆之间, 也弥散在声色犬马的狂欢和空虚寂寞的灵魂、时间的荒涯和卑微的饮食男女等矛盾对立的景观和存在状态中。她执意要打碎那些笼罩在世界表面的崭新的、狂欢的东西, 从而还原出存在的苍凉本质。那么, 驱使张爱玲做这种透视的原因何在? 其苍凉是如何生成的? 又具有什么样的特性? 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苍凉的生成机制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 多次提到自己在写作时对“真实”或者“较近事实”的重视和追求, 并且表示写不出来也不打算写“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 原因在于后者显得过于夸张而脱离普通的人世, 而她旨在深入人生的底子。张爱玲对苍凉的选择乃是出于对真实的追求, 因为在她眼里, 苍凉是一种本质的存在。这种本质一方面体现在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背景笼罩着在世的人们。

在殖民主义长达一个世纪的控制中, 上海这个殖民都会成为“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杂糅、挤兑的所在, 西洋的观念和行为泥沙俱下, 封建文化传统依然残存, 人们陷入空前的精神失重状态, 及时行乐被奉为信仰, 苍凉包裹在摩登和庸碌的表面下。张爱玲看到: “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 可是这个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 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1](p114)} 这个时代被张爱玲解读成如下一幕场景: “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 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 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 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 再一看, 却是元宵的月亮, 红红地升起来。我想到: ‘这是个乱世’”。^{[2](273)} “乱世”几乎成为了张爱玲对世界的固定看法, 也奠定了其小说的整体氛围。另一方面, 苍凉也深深地镌刻在她的身世遭际中, 毋宁说张爱玲选择了苍凉的书写方式, 不如说苍凉选择了张爱玲作为体验和呈示的载体。作为前清官僚遗老的后代, 张爱玲从小目睹了没落贵族家庭在急剧裂变的社会中走向衰败, 求学香港大学却遭遇战争, 被迫中断了学业; 她所向往的父母之爱的相继失落, 她和汪伪集团文人胡兰城的结合并最终分手带给她的爱情信仰的破灭和

* [收稿日期] 2007-02-27

[作者简介] 王燕(1980-), 浙江舟山人,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编辑部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 现当代文学, 编辑学。

董学武, 男, 浙江海洋学院院长办公室, 硕士。

政治立场上的耻辱……对苍凉的真实体验,使张爱玲自然而然地把它作为刻画人生的底色和背景。

然而,对真实的追求在张爱玲那里有着更高的使命——“……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3](p115)}呈现现实的目的是为了反观和启示现实,或是人存在的状况。因此,苍凉,这一中国传统意境和情境在张爱玲那里拥有了多种指向和生成方式:它不仅指时代氛围和身世感受,更指向个体生存状态和人类命运,不仅体现为一种主观情绪体验,更承载着作者的存在之思,通过苍凉折射出个体生存困境和人性底色,审视和思考人生本质和自我存在的意义。换言之,苍凉最让人震撼之处就是张爱玲对自己存在的审视和思考,这是苍凉形成的深层机制,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来解读。

一方面,苍凉源于自我丧失的可悲。张爱玲对自己存在的审视和思考,在她大多数本文里恰恰是以反自我的形式存在,即表现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丧失及其可悲下场,以此反射自我获得的必要性。这种失去自我的苍凉在文本中具体表现为:

第一、对安稳的渴求而导致精神自我的陷落。需要指出的是,此安稳并不同于张爱玲所说的人生安稳的一面(它与人生的飞扬相对,指人生的恒常状态),它是对他人或物质的依赖而自动取消自我的力量和成为自己的勇气,其本质是空虚和平庸。这形象地表现在张爱玲笔下一个有讽刺意味的镜头:一对夫妇意识到寄人篱下的窘迫,想离开终究没有魄力,便转念说:“走,到楼上去!”^{[4](p88)}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稍微走远了点,离开了逼迫她的哥嫂,不过她是奔着婚姻去的,换言之,她只是上了另一个楼,跌进了另一种依附。在和范柳原的情爱拉锯战中,张爱玲刻画了一个女人的美貌和所有心思不过是为婚姻而存在的工具。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这样评价他俩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的。”庸俗指向这桩婚姻的功利和贫血——它的存在并不指向精神的需要——在白流苏眼里,爱情不过是婚姻的交易品,而范柳原也从灵魂的流浪者回到了世俗规则的顺从者。同样,《鸿鸾禧》中的母亲、《花凋》中的郑夫人,千方百计想在家庭中树立权威却处处自取其辱;《红玫瑰白玫瑰》中的烟鹂以卑怯拖住变质的婚姻,《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则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对安稳的渴望泯灭了人们的心智和精神之光,失去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和与外界抗争

的勇气。苍凉在此表现为,失去自我,使自身成为没有独立人格支撑的浮萍。

第二、对理想的放弃而导致真实自我的坠落。这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身上尤为典型。小说一开始,葛薇龙以尚未涉世的学生眼光打量姑妈家:“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潜意识里隐含着对姑妈所处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排斥,到后来在“走!不走!走!不走!”两个极端之间的徘徊,直至最后和浪荡公子乔琪结合并久住里面,表明自我在步步消亡。张爱玲在小说结尾处以葛薇龙在湾仔所见的情景——“脏虽脏,的确有几分狂欢的劲儿”隐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狂欢作为人生的一场声色表演宣告宁静、充实的内心之核的崩溃,预示着真实的生命需求让位给了欲罢不能的情色世界。在葛薇龙身上,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纠葛始终存在——一方面表现为以姑姑为代表的声色世界的强势,“总要嫁人的”观念使葛薇龙丧失了为前途奋斗的信心,一方面也显示出她对这个声光世界的迷恋,以致于“愿意做一个新的人”的愿望越来越虚弱,最终因为无法重建自我而被上流社会网络。苍凉在此表现为在狂欢的背后,人对自身的不可掌控和空虚。

第三、人性的扭曲导致生命之光的泯灭。与自我向周围环境妥协而丧失相比,这种丧失显得更为彻底。以《金锁记》为例,张爱玲一开始将七巧安置在痛苦的根基上,在遭人厌弃、与软骨病丈夫相伴和感情受到欺骗中赋予她对自我的体认:既感受到生命、热量的存在,又承受着肉体、情感的忽略。这是《金锁记》的强烈痛感之一。然而七巧的全部阴毒和丑陋又恰恰表现在对自我的扼杀和泯灭,成为了金钱的奴隶和儿女爱情、婚姻的刽子手。作者这样描绘七巧的住所:“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这光,从某种意义上便是生命的亮光。自我并非自私,而是披照着人性亮光和担当生命责任的自觉,七巧将儿女的存在视为棋子,任意的操纵、蹂躏他们,实际上也是在扼杀自我。生命之光的失去也表现在《第一炉香》的姑妈身上,她对侄女葛薇龙的利用和欺骗与七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皇陵般的住所也正象征着她精神的死亡。苍凉在此显示为人对自己生命之光的践踏,一步步走向黑暗的人生结局。

人不能成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自我,精神变得麻木而免去了醒着的痛苦,从而在平庸、虚无甚至丑陋中度过一生,这种存在的失重无疑是苍凉的,

张爱玲越是将人性刻画得如此,越让人产生拥抱健全自我的愿望,小说呈现出的对人性的有力召唤也正体现在此。

另一方面,苍凉源于自我获得的艰难。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自我的寻求和获得恰恰通过放弃而取得,即摆脱肉体和他者的拘禁,在精神的国度里自由飞翔。如果说上文提到的自我丧失意味着主动放弃对生命价值的思索和探寻,由此产生的苍凉是消极的,那么主动寻求自我并背负其中的艰难,便呈现出个体对生命的自觉承担,则是更富有悲剧感的苍凉。

这个典型的方式可以从张爱玲十五岁写的《霸王别姬》里看到,这篇并非代表作的作品昭示出张爱玲的生命立场。这里,她将场景移到古代,把在权利角逐场中成为牺牲品的虞姬塑造成了一个独立处置生命的女子,上演了一出姬别霸王而非霸王别姬的戏剧,完成了自我主动与被动的置换。在四面楚歌中,虞姬选择自刎,说:“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鞘。”收鞘意味着结束生命,也意味着结束不由自主的命运。这句话至少包含着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我”强调主体,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喜欢”强调自我体验和自我选择,充满自由色彩。第二、将自我从对他人的依附中剥离出来,返回自身,赋予生命的自我承担感。这句话消除了“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的凄凉意味,带着独自决断的意味;第三、自己处置生命,而不愿将处置权交给他者。虞姬的死是带着自我取得和自我(肉体)消失的双重意味的,前者因为后者才获得,或者说正因为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必要,不得不向死而生。苍凉在此的含义变成:在生命的旅途中自主截断无我的前途,把自己抛向自由之境,拒绝等待命运的腐蚀。这不同于鲁迅、郁达夫等作家呈现的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困顿、呐喊和彷徨,也不同于巴金、丁玲等作家表现人们在觉醒中挣扎、逃亡的激烈和疯狂,而是带着旁观者般的清醒和决绝。

而另一种因放弃而得到自我的方式体现在《金锁记》中长安的身上,在这个时时被取消生存自主权的人物身上,我们似乎听不到她的心声。但在她和童世舫提出分手的刹那,我们却得见长安的内心世界:她不想自己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让别人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自己早早结束了它。在那个苍凉的手势里,自我复苏了,长安首次拥有了对人生的看法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不同于虞姬对生命的舍弃,长安是经历了对所求之物——爱情的放弃而拥有了自我。尽管这结局含有太多的无奈

和失落,但并不妨碍长安去感受自己的生命,并力图存留最后的完美,这种绝决和清醒绝不输于七巧一生的报复。

自我的获得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个体精神不断追求完善和提升途中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而在张爱玲文本中,迈出这基本的一步也不得不付出沉痛的代价,仿佛自我并不属于自己,而要从别处抢夺回来;甚至它已被周围环境取消了,只在“朱红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露出“怯怯的眼睛”^{[5](10)},个人挣扎在卑微的欲念和虚荣中,这是苍凉的本源。或许因此,张爱玲的作品缺乏自我提升的力量和崇高的精神折光,如她自己所说:“我的作品缺少力。她的笔下也都只能是些小人物,有着某种不彻底性,然而她对人生世事的显现和剖析使我们能沉下心来面对灰暗而渺小的人生的机会,它们和崇高、悲壮一样构成了人性。”

二、苍凉的现代性含蕴

克尔凯郭尔说:“生存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追求作为自己命运的自我。”^[6]但自我容易被战争、意识形态、现代化机器、无孔不入的信息等形形色色的东西篡夺与遮蔽,沦为被动或物化的存在。因此呈现个体与外界的紧张关系,在外界的挤兑和遮蔽下返回自身、寻求自我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这种现代性在西方往往通过脱离现实逻辑的怪诞场景和扭曲变形的人物呈现,产生了“荒诞”“虚无”“恶心”“焦虑”“失落”等一系列抽象意味的存在性名词,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则具体表现为苍凉,并且到了她这里,西方现代性中的抽象意味和怪诞场景消失,取而代之一种真实平淡的生活和人生本相。同时在20世纪中国文学普遍将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视为现代性的内容下,张爱玲的苍凉亦丰富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涵,它把对理想人物的塑造和社会价值的追求回落到了对普通人生的关照和自我价值的呈现,以存在本身来启示获得自我的重要性,以活生生的现实场景替代概念化、平板化的戏剧场景。因此,无论和西方还是和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比较,张爱玲小说中苍凉的现代性是独特的。

第一、苍凉承载着作者的存在之思。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可以说,她的“野心”就在于启示。虽然作者没有明说启示的具体含义,但我们能体会到,苍凉是对个体存在状态的表述和思考——在庸常的生活或强力的社会面前(往往诉诸于某些强势的人群),自我是得到确立和巩固还是泥一样的

委弃和屈服?苍凉所要折射的正是人性的复杂和自我复苏的必要性。相比西方现代性对人存在的关注多在呈现人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中完成,追求的是自我存在的完整和独立,张爱玲对人存在的关注则更多的将目光投注于人自身的弱点、欲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探寻人如何突破庸常生活和他人的挤兑以确立和巩固自我,可以说,这种带有内省意味的存在之思,是更为犀利和深刻的。启示往往伴随着思考。在小说中,张爱玲对人生在世的思考一方面通过生命存在方式本身呈现,即通过展现作品人物的命运遭际,让人们不由自主思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则赋予小说人物对生存处境的感知和反观,间接传达作者对人生在世的看法,如在《金锁记》的结尾安排曹七巧晚年对青春时代的回忆,《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在对乔治说了“他们是被动的,而我是自愿”后的暗中哭泣,虞姬每逢项羽睡后对自己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的怀疑以及聂传庆反省他的痛苦的根源,感受到存在于他自身内的聂介臣等等,这些人都在自我失去和惊醒当中徘徊,于不经意间和自己的灵魂打了照面。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些感知通常由周围的环境作为触点,由一面墙引发对永恒的思考(《倾城之恋》),由凄清的天与海产生的对未来的恐惧(《沉香屑·第一炉香》),由手镯和干瘪的手臂产生对青春逝去的悲凉等等,几乎她笔下的人都能从普通的事物中照见自己,或者由别人的视角照见自身。这样的处理效果是,人们不仅是在看一个故事,更是在体会一场人生。同时,作者还将这种思考穿插在叙述者的口吻中,如在《倾城之恋》中叙述者对白公馆的评价:“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对人生命运和处境的感慨:“传奇里的倾城倾国的人大抵如此。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琉璃瓦》)等等,一针见血地道出人生在世的荒凉处境。可以说,自觉的反观和思考完成了小说人物由被呈现、被塑造到体会到自我存在的转变,如此,外界的苍凉才真正通过自我的咀嚼变成深深意识到的苍凉,同时存在之思也使张爱玲得以超越小我的情感和呓语,成为人类存在的眺望者和思考者。

第二,苍凉具有消解性和召唤性。如果说在西方现代性文本中荒诞、恶心、虚无等等是完成对现

代工业化进程对人的戕害的控诉和对工具理性的解构,那么,张爱玲的苍凉则体现对人类物欲化存在和精神孱弱的解构和抛弃,是对人自我本身虚无化的消解,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消解。在张爱玲的文本中,无论是对那些以儿女婚姻作为光耀门第或充当儿女幸福刽子手的父母们,还是对那些生而为嫁的儿女们,无论是对缺少决断力和承担感的丈夫们,还是对喋喋不休的妻子们,都体现出张爱玲对饮食男女生存形态和价值观的嘲讽和否定。在《有女同车》中,张爱玲对那些整天围着男人转的女人感慨到:“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这种感慨在《烬余录》中上升到对人类文明的审视:“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可以说,张爱玲在热衷描写饮食男女的背后,从未失去对他们的审视,甚至从未停止过怀疑和批判。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苍凉的消解性还体现为对传奇人生以及乌托邦情感的消解,还原出人性的真实画面。小说中,她所描写的人物身份、营造的环境和故事多数有别于一般的市井百姓,显出传奇色彩,然而,实质上,无一例外的,这种看似传奇的起点最终无论是人物对生活选择还是存在的价值都滑向庸常和平淡,由原先的非非想转向平实的生活,呈现出张爱玲对传奇的一奇到底的解构,这是她和鸳蝴派本质的区别。同时,与那些在人性复苏之期描写母爱的伟大、女人开始渴望独立、追逐自己的爱情等正面的、积极的情感不同,张爱玲带着一种看透人世的表情描写家庭的倾轧、人性的沦落和自愿做笼中鸟等负面的情感,揭示了在新旧制度交替之间,人性中仍然固守的阴暗一面。张爱玲的苍凉指向人心的流离失所、自我被环境驱使和取消,消解对人性所抱的幻想。鲁迅在《论睁了眼看》文章中批评“瞒和骗”的文艺时曾说:“中国的文人,对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可是在张爱玲身上做到了这点,这个秘诀就在于她尊重的是人性和存在本身,能“真诚的,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标志——直面并反省人生和社会。而这一切的背后,则隐藏着作者对丰盈生命的召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召唤并不直接表现在她的小说里(在她的小说中,往往将对人生出路的张望卡断在现实的无望和凝滞中),而隐隐透露在她的散文中,从而和小

说形成互文关系。比如在《谈女人》中,我们依稀可以从张爱玲对地母的礼赞中看出她对健康女人的期待——如地母般“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拥有茁壮生命力、拥有自我、爱和赐予能力的女人,在《造人》中反问那些盲目的繁衍: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这些都表明张爱玲对健康人生所抱有的盼望。

第三,苍凉体现存在的易逝和恒常性。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自我,发现人类共同的人性和处境,引起人们的共鸣。刘杰锋认为张爱玲“从确认五四文学的那种宏大的集体叙事倾向转向发掘五四文学的那种微小的个人叙事倾向”^[7]不仅仅指题材上与左翼文学不同,更显示出对人生本质的独特理解和把握——“渴望文学创作透过现象表现人生本质,透过时代的氛围表现那体现了人类的永恒追求的人生目标”^[8]。一方面,苍凉流露出人在变化不定的时代里的漂泊感,折射出人存在的偶然和易逝。另一方面,苍凉概括了那个时代和芸芸众生的生存况味,基于此,在作品中,张爱玲选择凡人来作为启示的承载体,因为“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是永恒人性的承载体。在他们身上,流露出生命本身的欢娱和自由色彩。张爱玲正是用凡人的生活来启示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真相,用凡人的生活来关照凡人,引起他们的共鸣,使他们作为旁观者看清自己的面目,从而更好地追求生命的价值,这在现代中国文坛中,企图通过塑造高大全人物、通过在革命暴风雨中洗礼的人们来改造国民性是一个异数。

结语

文学现代性在新文化运动中,曾一度被简化为启蒙主义或现代化的产儿,充当唤醒民众社会价值的工具,而缺少对现代性的审美性和表现个体生命价值等功能的探讨。而张爱玲则将现代性从意识形态的途中导入个体存在状态和心理氛围,使现代性显得血肉饱满,充满生命气息。以现在的眼光看,张爱玲是一个葆有自由创作意识的作家,她的写作手法、体裁和艺术观点都自成一体,风格独特;同时,天赋的敏感和对世俗的贴恋,使她能将现代性扎根在现实生活中的,在庸常、琐碎的形象中照见人性,将遮蔽灵魂的外壳和假面剥落,使其在苍茫的社会荒原里迸发出一丝震颤,这对“人的遮蔽”在21世纪普遍存在的年代和当下日益物欲化、庸俗化的写作,具有警示作用。同时存在之思使她的小说能透过浮面的生活沉入人生的底部,探索到一切时代人之意味,这也使得张爱玲无法真正贴恋世俗,成为轻松的传奇杜撰者,而注定要在精神上成为人生的孤独守望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苍凉从那些遗老遗少等这些重重的人影中弥漫出来,浸染了现代乃至以后的时代。

[参考文献]

- [1][2][3][4] 来凤仪. 张爱玲散文全编[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 [5] 张爱玲. 张爱玲作品[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
- [6] 克尔凯郭尔. 真理即主体性[A]. 胡景钟. 西方宗教哲学文选[C].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7][8] 刘杰锋. 论张爱玲的现代性及其生成方式[J]. 文学评论,2004,(6).

(责任编辑:杨 睿)

On producing mechanism of bleakness in Zhang Ailing's novels and its modern implication

WANG Yan¹, DONG Xue - wu²

(1.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ejiang Zhoushan 316000;

2. President Office,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ejiang Zhoushan 316000, China)

Abstract: Bleakness in Zhang Ailing's novels, which not only refers to the era atmosphere and life experience but also refers to living status and fortune of a person and which not only embodies subjectively emotional experience but also carries the author's hope for survival, has many meanings and producing methods. The bleakness in Zhang Ailing's novels revealed her explanation of the life of common people and legendary life, expressed her call for rich life experience, described easy elapse of human life and perpetual existence of some human living methods and has adhoc modern character. Meanwhile, Zhang Ailing's deep concern and deep disclosure about human nature is of vigilant significance to more and more materialization and vulgarization of human desire in current literary works and present popular phenomena "which human nature is concealed".

Keywords: Zhang Ailing's novel; bleakness; modernness